

影视史料与历史学“非在场”书写

张晓校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系,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以“影”与“视”为核心内容的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既是充实,也是冲击。史学研究、历史书写者同时面临不断递增的新样态史料,急需建构新的援引规范。无疑,影视史料的种类、数量与日俱增,为历史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的”资料。但“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尚未构成颠覆性影响,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依然会游走于传统史料和影视史料之间,“非在场”身份定位亦不可能发生改变。为历史书写很大程度上为书写者“非在场”的书写。

【关键词】影视史料;“非在场”;历史书写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6-0090-06

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曾指出,当代史学正在经历一场“资料革命”,并在此断言之前,专门指出图像材料、一张照片、一部电影史料价值,强调这些资料都属于“第一层次”的资料^{[1](pp.6-7)}。勒高夫并未涉及“影视史料”对于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历史学发展的价值意义,但无可质疑的是,指出电影的史料价值已经接近了我们所议论的影视史料。由于时代的局限,勒高夫无法对借助现代化传播媒介,无孔不入的各种形式的影像、影视传播,以及由此生成的影视史料“先知先觉”,但勒高夫的“资料革命”却理应成为历史学研究面临的“海量”的新资料——新的史料——一种有意义的启迪。与勒高夫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影视史料更具有革命性。或许可以认为,日益丰富的影视史料,会真正促使历史学研究、历史学书写“资料革命”的发生。笔者以为,“资料革命”不仅指量的突破性积累,还应关注各种史料生成与存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历史书写者的定位诉求。其实,对于史料的关注及其评价,中国学术大师梁启超也有过类似的议论。梁启超在论及史学进步的两大特征时,强调其中之一“为客观的史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2](p.15)}当然,历史学专业工作者绝不会对纸质文本资料以外的各类资料熟视无睹,但梁启超的论述却在提醒,传统史料以外的各种史料必须予以关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勒高夫的前辈,年鉴学派第一代大师马克·布洛赫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历史的证据其类型之多不胜数”^{[3](p.52)}。从马克·布

洛赫的论述,到勒高夫的“资料革命”,无不揭示出史料日益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对于历史学叙事、书写而言,一如既往地重视传统的、以纸质文本为主要的史料是必要的,挖掘、审视日益丰富的影视史料同样不可或缺。作为新型样态的影视史料存在形式、表现方式,乃至阅读方法均与传统史料别若天渊,例如,前者以其直观、生动、形象展现历史的面貌,后者尽管也具备展现历史客观之功能,但对于书写者和阅读者而言,主要还仰赖理解与想象。影视史料与传统史料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为历史书写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素材,然而,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与地位并未改变,即使在信息技术异常发达的时代,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也不会发生改变。

一、关于影视史料

影视史料及其价值,以及对于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毋庸深入、展开评述,但何谓影视史料,至今尚未见到权威性的界说与定义。我们认为,影视资料应指那些借助现代化传媒技术手段,对社会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类事件进行现场影像记录——客观记录,带有明显“实录”性质的各种生动的、以影像为主的资料。今天看来,已经具备“完成时态”的各种影视资料,即是对过去的事情——已发生事情的描述、记录,必定拥有“所描述的事实乃是过去的事实”的特点^{[4](p.11)};也具备了“……可以是任何为我们留下过去痕迹的东西”等史料特征^{[5](p.63)}。影视史料之所以使用

“影视”为定语,原因在于“影视”更能够体现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时代特征,既有形形色色“影”,也有多种多样的“视”,还包括不同种类的“声”,为传统的影像资料、影音资料不能比拟。今天的影视史料及其获得不仅借助了传统技术手段,而且凸显了现代信息技术的独到优势,生成路径与生俱来地拥有了多样性特征。比如,传统的影像资料主要通过众所周知的照相机、摄影机、摄像机获得,今天人们获得各类影视资料的途径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技术手段,除了专业(职业)工作者的工作外,几乎是人手一部的手机,也成为影视信息、影视资料的重要来源;某人不经意之间拍摄的某个场景、场面,或许就是改变历史进程的某个重大事件的关节点,成为解读某项重大事件的具体记录。此外,遍布城乡的各种监控摄像所记录的资料,无疑也必然成为影视资料的重要来源,必将成为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按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伊格尔斯的观点,当属史料范畴的影视史料是“未写成文字的历史学形式”^{[6](p.20)}。尽管伊格尔斯并未明确指出影视史料包括其中,但非同于一般文字史料的影视史料“也一样地重要”^{[6](p.20)},需要对影视史料的挖掘整理。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工作者往往对“经典”文本津津乐道,与此相关,影视史料可否存在“经典”概念呢?笔者以为,经典的影视史料一定存在,其价值意义并不会逊色于传统意义的经典文本资料。当下的问题是,到底哪些影视史料可以称得上“经典”?何时能够成为人们认可的“经典”?还需要历史学研究的实践检验。

影视史料与传统史料最大不同点之一是,许多资料在进入历史学书写者视野之前,已为大众公众所知晓。许多资料生成时带有鲜明的新闻性特征,借助大众传媒、网络的传播,走入千家万户并不稀奇。相比之下,其他各种存在形态的史料绝大多数不具备新闻性特点,不可能是大众公众喜闻乐见的生成形式和存在方式。历史书写者引用、参考的诸多其他形式的史料不一定具备大众公众所熟知的特点。档案文献即是如此。一方面在某些档案文献没有解密之前,绝大多数人不可查阅;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价值甚高的解密档案文献,亦不可能为普通大众所关注。从这一意义层面分析,影视史料与传统史料的一个时代性差异是,日益丰富的影视史料借助了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与大众传媒搭建的平台,在作为历史书写的基础材料之前,已与大众文化结缘,使影视史料凸显了传统史料不具备的“大众性”特征^①。

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影视史料门类日益增多。在生成过程中,相当数量的影视资料往往通过现场直播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网络、微信等平台,即时地与大众公众见面。对于那些与影视记录同时代的人而言,更多地表现为大众传媒特有的新闻性。一旦事过境迁,这

些影像资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珍贵的史料。和其他形式史料一样,在不同的视域内,其属性迥然有别:同样可以作为文学素材,同样可以作为新闻资料,等等。在历史书写者心目中,影视资料即是“影视史料”。可以预测,影视史料将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数量上呈日益增多之势,必将逐步被历史书写者、研究者所重视。未来的历史学工作者不仅还像往昔一样,搜集大量的纸质文本资料,还要搜集各种数字化产品为主体的影视史料,以备书写历史之用。尽管关于影视史料的援引及其规范至今尚未有一个史学界公认的范式,但逾越这种障碍只是时间问题。当下需要历史学工作者重视的是,影视史料对史学研究、历史书写不仅意味着“资料革命”,而且日益丰富的影视史料势必对史学研究产生震撼性影响。某种情况下,影视史料所发挥的作用是传统史料望尘莫及的。比如,对各种地形、地貌的记述,自然灾害发生时的瞬间的现场记录,人物表情的展现等,传统纸质文本资料望尘莫及。然而,这些影视史料自身的优长,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史料形式的遮蔽,仅仅对传统史料某些缺陷的弥补、补充^②。实践证明,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历史资料的存在方式、存在样态正在步入一个多元化时代。这种多元化昭示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并通过“资料革命”推动历史学书写的进步。

影视史料存在的特殊样态——不同于传统史料的存在样态,还改变了搜集、保存史料的方式方法。以纸质文本为核心的传统史料,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传统意义色彩浓重的“书”与“本”,影视史料则可以是移动硬盘、各种经过压缩的光盘、“云储存”、数据库等,乃至今天无法预知的、新的数字化保存方式或手段,并且从诸多层面表现出信息时代信息的“海量”特征。传统的记卡片式的史料搜集、整理不会被取代,但获取影视史料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知识。

与其他诸多种类的史料相比,影视史料有自己的优势和特长,但也存在某些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比如,所有影视资料必须借助相应的辅助手段,以及各种必不可少的“硬件”设施进行“阅读”或观看,突出了感官视听—阅读;一些数字化压缩文档,还需要借助必要的解码技术等等。一旦离开了必要的“硬件”设施,以及相应的软件支持,这些资料便丝毫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① 诚然,影视史料也并非一个百分之百的开放性系统,亦存在相当多的影视资料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内容,但比之传统文献史料,影视史料的大众性应是重要特征之一。

② 传统上,人们认为史料“不可复制”(见[英]汤因比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页)。影视史料则改变传统史料的存在现状,不仅可以复制乃至规模性复制,甚至可以“复现”某些场景、场面。

此外,无论什么技术水平的影视资料,都不可能展示社会的全貌,碎片化特征是明显的;影视史料的确可以形象展现某一历史事件具体的、细节的过程,而历史书写者不仅关心过程,更关心过程生成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各种影视资料可以叙述客观事件,却无法表达历史书写者对社会、历史的剖析与认知,一些需要咀嚼回味的深邃思想,影视资料同样不具备文本资料的厚重;影视资料可以表达人的各种行为模式,却无法表达各种行为背后的、抽象的驱动因素,如规律等;再比如,经济史研究离不开各种统计数据、表格乃至各种账单等等,这些也是影视史料从不涉及,或难以企及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影视资料可以提供的细节无疑是形象的、具体的,但历史书写除了关注事件的发展之外,必然要把事件置于宏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使历史作品具备相应的厚重与立体感。显然,一般的影视资料无法达到这样的目的。与整体的历史学书写相比,各种影视资料仅仅是素材,仅仅是基础资料,是人们所理解历史的建构材料。历史书写者的核心任务是,将这些史料放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说明这些资料的价值意义。诚然,影视史料的制作者也会对所拍摄对象进行评论、解说(如解说词、画外音等),但这种解说、议论远非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的评论。当代法国学者阿隆指出:“在书写历史的时候,一种超越是必需的,哪怕是瞬间的超越也是必需的……。”^{[7](p.123)}这种超越是历史书写者对史料的超越,如果实现不了这种超越,历史书写的价值便大打折扣。

历史本身具有“包罗万象”之特征。影视史料的确能够记录从微观至宏观的社会变迁,记录这些变迁的细节。这些微观与宏观的细节,的确凸显了传统史料,尤其是纸质文本资料不具备的优势。作为史料的影视资料具有自己的优长,但设想影视史料颠覆、遮蔽传统史料也是不现实的。

二、“非在场”书写

“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8](p.45)}

由此可知,历史与书写密不可分;没有书写,历史无从谈起。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基础上的。无论影视史料何等珍贵,史料永远是建构历史的素材和资料,并不等于历史。影视史料成为历史内容,需要历史书写者的智慧和劳动。介于史料与历史之间的历史书写,是历史生成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未来的岁月里,历史书写者游走于影视史料与传统史料之间,在两种史料里爬梳必将很快变成现实。

当影视资料成为影视史料时,影视资料的记录者,会随之产生记录者与亲历者双重身份。和纸质文本资料一样,记录者、亲历者可能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工作者,也有可能具备其他身份^①。换句话说,留下这些珍贵资

料的人,并不一定全部是历史学家。反之,设想每一位从事历史学书写个体成员都成为出色的、信息传媒技术出众技术工作者,每每亲临现场,拍摄某些场景,记录某些场面,也是非常不现实的。历史学家书写历史过程中的亲历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马迁,西方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都在他们的传世之作书写过程中注入了个人的亲历或亲身考察。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工作者、历史的书写者既是某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影视资料的拍摄者、记录者。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历史书写者并非百分之百的历史全部(抑或局部)过程亲历者,所有的“在场”都是局部的、“片段”的,而那些为经历的“不在场”却是全局的、宏阔的,或是个人无法亲身经历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所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时间段上与修氏同时,但一个为人忽视的事实是:“在他写作该著作时,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开始……他在确切记述27年的冲突及其进展时,并不清楚他开始撰写历史时发生的事情……。”^{[9](p.22)}法国学者阿隆所论历史书写的超越,既包括了对史料的超越,也包括对“整个过程的旁边观看”^{[7](p.123)}。无论是超越,抑或“旁边观看”,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依然是“资料革命”背景下无法回避的问题。换言之,超越和“旁边观看”及其实现,主要是历史书写者“非在场”状态下完成的。

影视史料的客观性、纪实性远远超出了传统史料。但和所有的史料一样,影视史料在生成过程中,注入某些“生产者”个人的认识或情感因素,乃至偏见、成见并不奇怪。因此,历史书写者完成历史书写时,甄别、筛选、辨伪是必要的。历史书写者书写历史过程中,会和其他史料一样对待影视史料,绝不可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学研究的各种方法:实证、分析、批判、辨伪^②、求证、考据等,对于影视史料同样适用。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历史学研究的常见的方法,恰恰昭示出历史学家“非在场”书写的意义,即采用这些方法只能在“非在场”条件下完成。笔者认为,对于包括影视史料在内的各种史料而言,历史书写者“在场”是相对的、有限的,而“非在场”则是绝对的、无限的。所谓相对、有限指的是,即使历

① 援引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话说,亲历者与历史书写者为“同一个人”时,亲历者成为了历史学家(见[英]汤因比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这种情况在古代历史学家比较常见,如修昔底德、色诺芬、恺撒等。

② 既然是史料,使用过程中辨伪不可或缺。但影视史料的辨伪似乎更强调自己的技术规则,或者说,除了传统的手段方法外,还关注信息技术的运用。

史书写者经历、并通过影视技术记录了某个历史事件,但这种亲身经历和事件所处的社会背景比较一定是相对的、有限的,即使是现场记录者,事件的参与者,也只是整体社会历史的局部记录者、参与者,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在社会的全景“尽收眼底”,所获得的信息一定是相对的;历史书写者即使是历史过程的参与者,其个人大事经历、所见所闻,和宏大的历史进程相比,也是“点”与“面”、“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和其他纸质文本一样,在影视史料形成过程中,历史书写者的个人经历的时空,和宏阔的社会历史时空相比也是有限的、相对的。所谓绝对的、无限的系指,历史学书写的对象永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化结构,历史也永远不可能变成“流水账”。一个看似通过影视画面说清楚的事件,背后蕴含的抽象意义是深厚的,信息含量是巨大的,对历史终极意义的追问,对于历史学研究者、书写者而言必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史书写者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诠释、感悟,乃至情感的抒发,一定要通过“非在场”的形式予以表达。关注历史学的“非在场”书写与叙事,不仅是叙事者、书写者的身份定位,更是对历史著作生成路径的剖析。

伴随影视史料作为新的史料样态,必然会对历史学研究、历史学写作产生冲击性影响。比如,历史学研究者、书写者一定会重新审视、考量影视史料在历史学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以及对自己研究论点支撑的作用。无疑,从史料学的视角考量影视史料,人们自然会看出与传统史料存在形式上的差异性。但史料存在和表现形式的差异——外在的差异,并未改变史料所应有的内在规定性,自然不可能改变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定位。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者们,依然会在史料遴选与写作历史之间孜孜以求地研判、取舍。“历史学家不仅是过去实在的发现者,还更其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种沟通者(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阐释者[hermeneutes])。”^{[8](p.97)}“论述历史修撰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所有历史叙事都包含着不可简约和无法抹掉的阐释因素。”^{[10](p.63)}西方学者所论“阐释因素”、“阐释者”从另一个角度,表述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地位。由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定位,不难理解历史写作者的书写实乃“非在场”书写。此外,历史学家、历史学书写者不仅仅是史料与当下之间的“阐释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居于“中间环节”的“连接者”,扮演的是多曼斯卡言称的“中介的角色”^{[8](p.322)}。当然,无论是“阐释者”,还是“连接者”,抑或“中介的角色”,都说明了历史书写者在实践中,既有搜集、占有各种史料的书写铺垫,也有写作过程中对各种史料的反思,并一定会在作品中注入个人的观点、思想等^①。因此,历史书写者的劳动是针对各种

史料的一种“非在场”的劳动。只有这种“非在场”的写作,方能实现对史料的解构,并进而完成历史著作的建构。对于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定位,当代西方学者表述为,历史学家“外在”于客观史实,“外在于他所研究的实在”^{[8](pp.150-152)}。笔者认为,历史学家这种“外在”的身份实际上就是对其“非在场”的另一种表述。

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丰富、繁荣的影视史料,的确会对传统的历史学书写产生消解作用,但必须看到这种消解是有限的,尚无法构成颠覆性影响。对于历史书写者而言,影视史料并未降解其“非在场”的身份定位。反之,影视史料从新的角度证实了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定位。比如,影视史料以其“传真”、“实录”、声像并茂等优势,为传统史料无法比拟。但这些资料无论视角如何,均不可能记录整个社会的变迁,各种细节的记载集中在局部,绝大多数是历史的横断面。将这些零散的乃至碎片化的整合,是历史书写的核心工作之一。这些整合、整理等工作一定是历史书写者以“非在场”身份完成的,即使书写者本人也是各种影视史料记载史实的参与者、经历者。

“对于希罗多德来说,重要的是报道已经发生了的事情……。”^{[11](p.10)}今天所见各类影视史料,不属于“过去时”,也属于“完成时”,是一种“过去的实在”^{[8](p.150)}。就此意义而言,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形成的影视史料,在所报道的事实与希罗多德的报道并无本质差异——对已发生事件的报道、记载。针对当下的历史书写者面对形形色色的影视史料,“非在场”身份定位更为直观。

影视史料的生成、传播的确与传统史料别若天渊,但就其史料属性而言,又与传统史料并无二致。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资料行业依据,也是历史书写的依据。历史书写者面对形形色色的史料,无论是纸质文本的,还是影视史料,都处于“完成时态”,是各种“成型”的资料。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书写或重构历史时,但“原始资料”不是“历史本身”的观点^{[12](p.115)},一方面说明了对史料“加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凸显出“追述”必定成为历史书写者的核心叙事形式^②;绝

① “怀特海认为,在观察与撰写历史中渗透着人的情感、意图以及理论解释。”见[英]汤因比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② 西方学者指出:“历史书写只是把服务于人们的目的往昔,那些获得认可的各项元素组合在一起。”(见John H. Arnold, Hist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此论点明显过于粗糙,但也指向了历史书写的关键之处,即历史书写的“非在场”和“追述”性是无法变更的。

大多数情况下,需要通过“追述”完成历史书写,是对“已发生事件的特点的陈述”^{[13](p.51)}。海登·怀特虽然没有使用“追述”一词,但他论述的历史学叙事的“再现模式”^{[10](p.125)},也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书写。面临影视史料,无论是“追述”,抑或“再现模式”,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书写都是不能否定的。

三、新的话语系统与“非在场”书写

“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10](p.127)},克罗齐这句名言点出了历史书写的本质。海登·怀特则强调,历史学的叙事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10](p.128)}。笔者认为,叙事、“话语形式”昭示了历史书写有自己的话语系统,一切叙事活动都归属这一话语系统。英国著名史家卡尔把历史比作一个过程,是一个“现在与过去无休止的对话”^{[12](p.115)}。我们据此可以理解为是当下与过去两个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当下的话语系统即历史书写者的话语系统^①,过去的话语系统则是以史料为核心的另一个话语系统。

影视史料与传统纸质文本史料相比,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如果历史书写者参与了影视所记录,影像资料会直观地表达出来。但和传统史料相比,新型的影视史料属于一套新的话语系统——一种与传统史料迥然不同的话语系统,一种超越了文字,形象表达的话语系统,是一种通过场景、画面,形象直观表达的叙事话语系统——一种通过“影视话语”转达信息的话语系统。历史学的书写者其实一直游走于两套话语系统中间——史料的话语系统和历史学叙事的话语系统。由于影视史料的加盟,历史书写者必定会游走于文字话语系统和“影视话语”之间。影视史料作为新型历史资料,至今尚未解决援引规范等技术性问题,即使解决了种种技术规范的难题,影视史料的话语系统也与传统史料所在话语系统千差万别。这套全新的话语系统如何建构,技术环节是需要逾越的障碍,观念上的认同似乎更重要。

影视史料作为一套新的话语系统,与各类传统史料最大的区别是,影视史料的“阅读”视听感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或者说,历史书写者在浩如烟海的影视史料中爬梳、筛选,许多时候是通过感官完成的,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研究埋头“故纸堆”治史方式。涉及与影视史料相关的话语系统,不容回避的问题,历史书写者在获取影视史料过程中,除了相应的软件与硬件支持条件外,还需掌握最基本的信息技术手段,这也是与传统史料为主的话语系统的不同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将进一步提升这套话语系统的重要性,并这套话语系统纳入历史学的叙事体系。当下亟待解决的是,如何建构一种人们认同的技术规范,使影视

史料自然地纳入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实践中。换句话说,影视史料不仅是一套全新的话语系统,而且还随之产生了新的阅读系统。

影视史料之所以称之为新的话语系统,是因为影视史料将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记录变成了图像或形象记录。作为新的记录形式,对已有的各种以文字为核心的记录是一种极大的补充。我们一再强调,影视史料对传统史料不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更不可能取而代之。影视史料之于历史书写,不仅和传统以文字记载并驾齐驱,还是传统史料前所未有的补充。于此形成的新的话语系统,与传统史料为核心的话语系统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我们强调“影视史料”作为新的话语系统,主要基于历史书写——文字书写——的考虑。当然,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也会带来历史书写的变革与革命,但在这种变革或革命尚未发生之前,历史书写一定是落实到文字的书写,或曰书本知识的历史。针对这种话语系统而言,影视史料必然成为另一套新的话语系统。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历史学家、历史书写者不仅要书写传统意义的“书本知识”,还应“书写”影视为载体的历史。但即便如此,以“视听”为主的、新的话语系统也不可能取代文本的话语系统,历史书写者必定还要在两个话语系统之间爬梳。比较而言,“影视史料”承载的内容是具象的、直观的,历史书写者的使用话语系统不仅是直观的、具象的,而且还应当是抽象的、概括的。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抽象,历史学书写也同样离不开抽象。比如,一些哲理性、思辨性的分析与表述,以及对流变的世界背后不变本质的拷问等,传统的文字表述依然会显示出比影视更多的优势。具象与抽象为核心的两套话语系统的同时存在,造就了历史书写离不开新的话语系统——由影视史料衍生的“影视话语”系统。在实践中,历史书写者所面对的“影视话语”与文字话语系统一定会归于史料话语系统——过去发生的记载,而历史书写者使用的一定是当下的叙事话语系统。但无论是“影视话语”的生成或归属,抑或文字话语系统与“影视话语”系统之间何种关系,历史书写者总是以“非在场”的身份定位运用不同的话语系统。史料的话语系统及其生成,决定了历史书写是一种“非在场”的书写。

讨论至此,我们还必须回到“资料革命”的话题上。无论怎样解说“资料革命”,“资料革命”的意义在于,伴随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历史资料呈日益丰富之势。但这一新的话语系统也是以史料为核心的话语系

① 关于历史书写者话语系统的内容结构,法国著名学者阿隆的论述颇具说服力:“历史学家的话语是由关于事件及其联系的命题所组成”(〔法〕阿隆著,西尔维·梅叙尔编注,张琳敏译:《历史讲演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统的组成部分。卡尔也强调,历史学家需要借助历史“辅助学科”——考古学、铭文学、钱币学和年代学完成历史研究^{[12](p.92)}。信息时代,这些“辅助学科”理所当然应该包括影视史料。历史书写者在进行历史书写过程中,必然离不开这些“辅助学科”,而且这种“依赖性”一定呈增长的趋势——史料的获得路径不断增多。由此而言,历史书写者面对新的话语系统——“影视话语”,实际上是对以文字资料为核心的话语系统的补充或扩展。影视史料催生了“影视话语”系统,使历史书写者在认真梳理文字话语系统的同时,也应借助“影视话语”系统完成历史书写。

就话语系统而言,以历史学家为主体的历史书写者的“非在场”身份定位,势必要建构一个他者话语系统——历史学叙事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永远建构在各种史料的基础之上,离不开“第三者”——史料叙事者提供的各种信息,历史书写者不仅要建构历史,而且还要借助各种形式的史料重构历史^①。

四、结语

历史书写者总是站在当下书写过去,建构历史叙事。由此不难发现,历史书写者不可能摆脱“在场”与“非在场”的悖论:一方面“在场”的历史书写者和叙事时会获得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场”不仅是有限的,书写与叙事及其完成总是不可超越的;一方面所谓的“在场”揭示了历史书写者既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行动者、目击者,也是记录人;另一方面,这些“在场”的参与并不能够取代事后属于“追述”——“非在场”的书写。历史书写者对过去的事实——史料进行观察分析、整理是必要的,即使书写、叙事主体“在场”,这些常识性基础工作也是“非在场”状况下完成的。传统史料当家的时代,这种“非在场”的特征毋庸置疑,与传统史料生成、存在方式迥然有别的影视史料,不仅丝毫没有降解历史书写者“非在场”的身份定位,反而可能会呈现强化的势头。其一,影视史料能够直观地反映历史书写者的“在场”与“非在场”;其二,历史书写者“追述”并未失去作用,所发生的改变主要是史料的样态,“非在场”的身份定位没有改变。

历史书写者与史料之间一定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实际上确定了历史书写者必定会以“非在场”身份书写历史。历史书写者与史料之间一定还是一种关系

的规定与制约,即历史书写者必定被限制在绝大部分史料之外,进而规定着“非在场”的历史书写者即使在信息时代,也不可能成为全部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更不可能经历、目击“过去人类活动的全体”,而只能用新样态史料进行“叙述和说明”^{[4](p.8)}。历史书写是一项主观性非常强的活动。但这种主观性“不是一种任意的客观性,而是一种正好适合历史的主观性。”^{[14](p.4)}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主观性既是历史书写者的价值判断,属“非在场”行为。当然,历史书写者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价值判断,纸质文本、影视史料都不鲜见,但对历史的整体审视,主要还是发生在“非在场”时段。运用各种史料,历史书写者有自己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更多地表现为“非在场”的话语权。

“资料革命”的意义需要考量,新样态史料的问世需要对历史书写者“非在场”身份定位有新的思考。

【参 考 文 献】

- [1] J. 勒高夫,等. 新史学[M]. 姚蒙编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法] 马克·布洛赫. 历史学家的技艺[M]. 张和声,程郁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 [4] [英]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M]. 何兆武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5] [英] 阿诺德(Arnold, J. H.). 历史之源(英汉对照)[M]. 李里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8.
- [6] [美] 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何兆武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
- [7] [法] 阿隆著,西尔维·梅叙尔编注. 历史讲演录[M]. 张琳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8] [波兰] 多曼斯卡编选. 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M]. 彭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9] Luke Pitcher, Writing Ancient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Published in 2009 by I. B. Tauris & Co Ltd.
- [10] 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张万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1] [德] 洛维特.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M]. 李秋零,田微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 [12] [英] 卡尔. 历史是什么?[M]. 陈恒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 [13] [美] 威廉·霍德. 历史哲学[M]. 王炜,尚新建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8.
- [14] [法] 利科. 历史与真理[M]. 姜志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

① 海登·怀特把历史叙事视为一个“编码和再解码的过程”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历史书写的重构过程。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